

少年有梦

1969年11月8日，王戟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王心、母亲刘桂枝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上海工程机械厂工作。当时，面对特殊的国际形势，我国开始了“大三线”建设，将部分重要工厂从沿海迁移到内陆地区。在此背景下，王心、刘桂枝所在的上海工程机械厂也随之内迁。就这样，3个月大的王戟随父母搬迁到了湖南常德。

小时候的王戟，似乎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调皮。到了要上学的年纪，刘桂枝赶紧带上王戟到班主任罗老师家作保证，她说：“罗老师你放心，王戟是调皮，但他上了学，一定会改的，因为他爱学习。”

刘桂枝敢说这句话，是因为她心里有底。厂里开办夜校，刘桂枝被选为教员，教数学课。王心经常出差，即使不出差也要加班。晚上孩子没人带，刘桂枝有时到夜校上课，就把王戟带上。她发现，当自己讲课的时候，王戟总是安静地盯着黑板，听课竟然比有些工人还要认真。回到家，他有时感觉意犹未尽，便拿根筷子，模仿妈妈讲课的样子，对着墙皮戳戳点点，自己讲给自己听。

有一次，刘桂枝问儿子：“人身上什么东西别人拿不走？”王戟愣了愣，没有答出来。刘桂枝指了指他的小脑袋瓜，说：“脑子里的知识。”王戟明白过来，笑了。

1976年9月1日，王戟6岁10个月，正式上了小学。人们发现，只要一坐进教室，王戟就很安静。他还很快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

在王戟读小学期间，刘桂枝一直坚持带他到夜校听课。王戟乐此不疲。他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基本学完了小学5年的数学课程，语文课也没怎么落下。刘桂枝后来回忆，这一辈子对于王戟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可以说，王戟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妈妈刘桂枝——是妈妈发现他有爱学习的好习惯，科学地加以引导；是妈妈在数学方面，早早开发了他的兴趣和智力。而数学能力，对于一个计算机软件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978年夏，刘桂枝看到常德一中的招生简章：今年秋季“小升初”，将面向常德地区统一招考，考语文、数学两种；而且年龄不限，允许插班生报名。

刘桂枝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她觉得，王戟的知识储备与学习能力，已经具备了上初中的水平。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王戟考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今国防科技大学）时，学校里只有干部才穿军装，这让渴望穿上戎装的王戟倍感遗憾。到1989年，学校纳入军队院校编制序列，其后所有新入学学员，只要符合条件，一律参军入伍。1990年4月，入读博士的王戟，终于穿上了心心念念的军装。

这一年的夏天，重庆姑娘黄春以高分考入该校，成为计算机系的一名新学员。

王戟当年入校时，因为身份是地方学员，只进行过一周的军训。他若要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得补上完整的军训课程。

暑热缓缓退去，怡人的秋天到来了。那一年军训，计算机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在同一个场地上训练。女学员本来就不多，因此她们格外引人注目。而黄春在女学员里面，又是比较出众的。

那时王戟还不到21岁，却已经在读博士了，而且是知名科学家陈火旺的博士生。黄春对王戟的最初感觉，就是比较佩服他，还带点好奇。一个月左右的军训结束，本科生回到教室上课，研究生回到实验室做研究。

一晃5年过去了。其间，王戟到澳门进修一年多，平时出差也多；黄春每天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学业繁重，她还担任女生区队的区队长，比别人更忙。他们后来在校园碰面的机会并不多。

一转眼，黄春本科毕业，顺利考上研究生，留在系里继续深造。因为在同一个系，王戟和她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

他们时常打电话，相约在科大校园里散步。京广铁路线就进校园穿过。夕阳西下，站在桥上看列车呼啸而过，他们感觉神清气爽，心胸开阔，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向往。

他们两个人最终走到一起，是水到渠成的事。采访时，我特意问王戟：“你感觉黄春有哪些地方吸引你？”他脱口而出：“黄春很聪明。”

我琢磨，以他的眼光看人，认为黄

她把这件事讲给王戟听，试探着问道：“你想不想考？”

王戟没有犹豫，爽快地回答：“想！”考试那天，母子俩4点钟就起床，搭乘厂里食堂买菜的“蹦蹦车”进城，天不亮就到了学校大门口。

考试成绩出来了，数学满分为100分，王戟考了96分，语文成绩也还算不错。

那年，王戟正式成为常德一中中部的一名新生。王戟本来就属于天资聪颖的孩子，一旦专注于学习，很快便崭露头角。1983年盛夏，不满14岁的王戟参加了高考。成绩公布，果然他在全校名列前茅，超过了北大、清华在湖南省的录取分数线。

拿到高分，也有烦恼——当然是“幸福的烦恼”。因为选择学校和专业，一样让人劳心费神。填报志愿时，王戟特别想上清华。但是父母觉得他年龄小，一个人跑那么远不放心。王戟有点闷闷不乐。刘桂枝意识到，必须打开儿子的心结。她换了个角度，问他：“王戟，你到底想学什么专业嘛？”

他冲口而出：“计算机！”计算机？刘桂枝、王心都是一愣。现在的3岁小孩都晓得计算机，但在那个年代，计算机还是一个非常陌生、非常模糊的概念，很多人甚至闻所未闻。

王戟以前从没说起过计算机，父母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冒出这么个念头。作为一名老牌大学生，刘桂枝清楚，孩子只有从事自己真心喜欢的专业，才有可能在未来取得更大成就。她笑着说：“想学计算机，你跑那么远干啥？去长沙就行嘛！长沙有个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今国防科技大学），你知道吗？听说那里就有计算机专业。”

听妈妈这么一说，王戟点头同意了。

若论名气，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不如其他几所重点大学有名。平常人家或许也搞不清这个学校是干什么的，头顶“国防”二字，更让它显得有点高深莫测。其实它的录取分数线一直以来并不低。高分、神秘，名气却不太大——因此，选这个学校，总让人感觉有点冒险，需要拿出勇气。

或许是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好奇心，让王戟更愿意探索、挑战未知领域。而计算机，正是当时的新生事物。他想，这个专业未来一定无比精彩，太值得探究了。

这就是他的梦想。

走向人生高地

——长篇纪实文学《轮椅上的战歌》节选（上）

■ 陶 纯



版式设计：王 凤

两个风华正茂、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就在那一天敞开心扉，互诉衷肠，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身边的老师、同学、战友，都为他们感到高兴。

那时他们正处于事业的起点，两人虽然在一个楼里办公，却难有闲暇谈情说爱。后来回忆恋爱时光，黄春并没有感到有啥委屈。她和王戟本来都是专注学习工作的人，对自己所喜欢的工作痴迷、不舍，胜过那些花前月下、风花雪月。

不久，黄春硕士毕业留校，进入给银河巨型机做软件的研究室工作。当年她报考这所大学，就是受到银河事业的感召。现在心愿得到了满足，她感到无比快乐，无比幸福。

定下单位，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下一件大事就是结婚了！

去领证那天，两人上午从单位出发，到长沙市开福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等办完，快到饭点了，他们沿着中山路往回走，觉得有点饿，随意在路边找了家饭馆，点了几个菜，庆祝婚姻大事完成。

人生本该浓墨重彩的一页，就这么轻轻掀过去了。

采访王戟时，我说：“你们办个简单的婚礼也可以嘛。”他说：“我和黄春都嫌麻烦，不愿费那个工夫。”

“你父母能同意？”

“他们从不干涉。”

“总得和父母、家人一块聚聚，吃顿饭吧？”

“之前已经和父母一块吃过饭了。再说，那天是个工作日，下午要上班，晚上还要加班。”

从王戟和黄春谈恋爱结婚，到他们一生小孩，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大体上是顺利的。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王戟，日复一日摇着轮椅走过校园；当年青春甜美的少女黄春，青丝间不知不觉冒出了少许白发。时光荏苒，但单位里的老同志们还记得，王戟和黄春朝气蓬勃从人前走过的样子。他们由衷感叹：“在当年，这两个背着双肩包的‘小胖子’，是科大校园里的一道风景。”

军旅作家陶纯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轮椅上的战歌》，生动记述了“时代楷模”王戟的动人事迹。本版选编其中8则故事，展现王戟的成长与奋斗历程，带领读者走近这位心怀赤诚、冲锋不止的军事科研工作者。内容分两期刊发，今天推出上篇。

——编 者

“前沿”一词本义指防御阵地最前面的边沿。

在科学研究中，什么是前沿？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科研中最新或领先的领域。

若想站上国际前沿，首先你得瞄准国际前沿，知道往哪个方向用力。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王戟读大学、硕士、博士的时候，软件工程像一个慢慢长大的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模样。由于当时我国用的普通基础软件大都是进口的，所以安全一直是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即使是中国人自研的软件，也会出现各种技术上的漏洞。这些安全漏洞如果出现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上，或者是重要武器装备上，损失可能会是灾难性的，也是难以挽回的。

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怎样进行系统研究，怎样自研软件去发现、修补系统软件的漏洞，还很少有人真正去做，相关领域基本上还是空白的。

在国防科技大学这个高水平平台上，不论从事科研，还是从事教学，总有很多成才机会；追逐世界的科研热点，融入国家的重大工程，可算作一条捷径。以王戟的潜质、能力，如果博士毕业留校后他想参与一些项目，比如投身银河、天河超级计算机研制，可以想象，他必定会有一展身手的机会。然而，他更倾向于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新路子。

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王戟的大脑中，一个新概念渐渐成形。恰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初试身手的机会。彼时，我国航天事业正处在关键阶段，从硬件到软件，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

1999年，王戟团队搞软件可靠性研究的消息传开后，他们被邀请到北京参与相关任务的可靠性评估。最紧张的时候，他们连续两天两夜不停地工作，终于找到了最适配的模型，完成了相关任务的可靠性评估。

这是王戟早期从事软件可靠性基础研究科学与工程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实践。从此，王戟的思路更加清晰，也坚定了在软件可靠性学术、科研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决心。

早期，人们将这类研究称为“可靠性”。王戟总觉得只说“可靠”，还是不够，叫“可信”，似乎更恰当、更确切；再进一步琢磨，规范，叫“高可信”，意思就清楚了。

王戟把“高可信软件技术”这一概念，以及围绕这一新概念、新领域做些事情的想法，跟自己的导师陈火旺院士作了比较深入的交流。

王戟清楚地记得，导师陈火旺听到“高可信软件技术”这一概念时，眼前一亮，他稍加思索，点点头说：“高可信软件技术，你提出得很及时，这个概念我觉得很有前瞻性。”

时隔不久，陈火旺和王戟共同组织了一场小范围的“高可信软件技术”学术报告会。王戟作了精心准备，并制作了幻灯片。这场报告会等于把“高可

生死线上

迹，是不幸中的万幸。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然而，命是保住了，他的双下肢却因缺血性坏死需要截肢。之后的一段时间，王戟又经历了多次手术。他每天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和护士轮流值班，时刻守护在王戟身边。

昏迷10多天之后，王戟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是妻子黄春温暖的笑容。黄春惊喜地俯下身子，柔声道：“王戟，你醒了呀……”

他动不了，一点都动弹不得，但可以缓慢地用语言交流。交流中，黄春发现，他对生病前的事情，包括发病当天和进手术室前的经历，都记得清清楚楚。这说明他的思维和记忆功能完好，这令黄春倍感欣慰。

那段时间王戟时常做梦，梦见自己到教室上课，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梦见自己在去机场的路上……他觉得自己仿佛在时光隧道里穿行。

手能够动弹之后，王戟自己看病历，才知道这些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头脑已经完全清醒，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睡了一个长觉，两条腿没了！

最初那几天，王戟很少说话。尽管他没有抱怨，没有流泪，但是黄春明显感觉到，他的心情很沉痛，情绪很焦虑、很烦闷。她宁愿他大哭一场，甚至骂两句，也不愿看见他沉默得像块石头。

医生说，一个人在遭受重病后，会有严重的不安全感，这时候需要多陪伴。自从王戟生病住院，黄春始终寸步不离地陪护。只要有机会，黄春就把女儿带来，让孩子陪爸爸玩。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以前王戟工作时，除了出差，就是加班，常常只有晚上见到孩子，而那时候

瞄准前沿

信”这个新概念正式对外提出来了。

参会者虽然都是搞计算机、搞软件的，但是好多人之前并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这个全新的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反响。那天，王戟重点讲的是怎样让高可信软件技术“落地”的问题，也就是让这项技术为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服务。

当年参加过那场学术报告会的年轻人，现在大多已成为科研、教学的中坚力量。许多年后，人们回忆当时的情景，认为那场报告会是王戟的精彩亮相，是他坚持挑战前沿研究的一个缩影。

同年，王戟随陈火旺到北京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会上，主办方出了个题目，让与会者回答——

“新世纪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师徒二人交出的答案是：“搞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

早期为确保软件的可靠性，研究者们主要进行技术探索，解决的是具体的技术问题，没有进行更深入地探索，也没有形成相关概念。随着王戟的研究工作被外界知晓，“高可信”这一概念逐渐被业界认可和接受，并成为学术领域。

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伴随了王戟全部的科研学术生涯。“只有做前沿的研究，才更容易发现前沿。”王戟经常用这句话勉励自己，也用来鼓励同事和学生。

可以预见，只要计算机还在发展，软件就会相应发展，对于高可信软件技术的需求，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军队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需求，也是没有止境的。这是一项处在前沿的事业，光靠一个人、几个人干肯定不行，得培养、建立一支队伍，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

孩子多半已经睡下。此刻见到女儿，他脸上浮起笑容，心情明显好转。学院的同事、学生们，也经常过来照看他，送来各种可口的饭菜。

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王戟的身体在缓慢地恢复。这时候，尽快让他走出焦虑，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有一天，医生小心翼翼地问她：“需不需要找一个心理医生？”

他摇摇头说：“不用。”他觉得自己能走出来，当然这需要一点时间。对于他来说，最困难的在于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困难。那时候不截肢不行，如今腿截了，已经没有选择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能面对，所以用不着找心理医生。

没过多久，王戟就缓过劲来了。俞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担任王戟的主管医生。在骨科医生眼中，截肢手术不算是大手术，但是对于病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截肢之后就意味着残疾，意味着生活上种种的不便。

作为王戟的主管医生，俞芳每天清晨都要从7楼骨科病房步行至3楼重症监护室查房。步行途中，她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她想多为他做些事：监测病情、执行常规检查、在心理上给予支持，还要鼓励他坚持康复训练。

但是进入监护室之后，她发现，王戟总是微笑着面对她。这让她感到，这个人的真的太了不起了！他的内心是何等强大！再回想一下，自王戟入院以来，自己几乎每天都和他接触，从没听见他抱怨一句。

她感叹道：“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